

電影藝術譯叢

第 7 輯



電影藝術譯叢

電影藝術譯叢編輯部編

中國電影出版社

第七輯

一九六四年·北京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電影藝術譯叢

第 7 輯 (1964 年 6 月出版)

編輯者：電影藝術譯叢編輯部
北京西單舍飯寺 12 號 電話：66·4445

出版發行者：中國電影出版社
北京西單舍飯寺 12 號 電話：66·5209

印刷者：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印刷廠
統一書號：8061·1165 定價：1.20 元



目次

千里馬时代的电影艺术.....〔朝鮮〕桂勛赫 吉秀岩 (1)

同时代一起前进的我国电影艺术.....〔朝鮮〕張亨俊 (16)

对我国故事片中正面形象的一些看法.....〔越南〕春 松 (31)

为了制定党对电影的政策与方針.....〔日本〕山形雄策 (42)

使电影政策符合政治宣言的精神.....〔印度尼西亚〕夏基安 (64)

印度尼西亚电影协会第一届全国会议

决议 (文件)..... (90)

印度尼西亚电影全国纲领 (文件)..... (94)

錫兰民族电影发展中的几个关键問題

(評論四則).....〔錫兰〕賈耶拉特 (100)



电影艺术及其剧作.....[苏联]屠尔金 (111)

电影的剧作法.....[德国]繆 勒 (129)

电影剧作与导演处理.....[法国]达 更 (150)

摄影机的创造作用.....[法国]馬尔丹 (173)

世界视象与电影形式.....[苏联]科茲洛夫 (199)

列夫·托尔斯泰的散文与当代电影.....[苏联]比林基斯 (231)

• 国外电影动态 •

南朝鮮电影的真相(264)

苏联《电影艺术》杂志发表文章吹捧南斯拉夫电影(270)

托埃普立茲談欧美电影学术研究的现状和发展(275)

編后記..... (280)



千里馬时代的电影艺术*

〔朝鮮〕桂勛赫 吉秀岩

三年前的11月27日，我们电影工作者与全体作家、艺术家一起，以无比感激和兴奋的心情接受了金日成同志具有历史意义的指示。在这次指示中，金日成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阐明了千里马时代的美学问题。

电影工作者积极地遵循领袖的教导，他们立即掀起了热烈的创作高潮。目前，我们的电影艺术已经能适应我国大繁荣的千里马时代的要求，走上了全面发展的道路。曾经暂时落后于飞跃发展的千里马现实的电影艺术，今天已经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旺盛的创作，丰硕的果实——我们可以用这两句话来概括这个时期电影艺术发展的总面貌。

从荣获“人民奖”的故事影片《分界线上的乡村》和《海鸥号船员》到《红色宣传员》、《红色花朵》、《百日红》，电影界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深受观众喜爱和支持的作品。

电影的主题领域扩大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独创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丰富了；新的、有才华的青年电影工作者正在大量涌现，使电影工作者的队伍能够发展壮大成为更有朝气、更有力量的部队。今天，我们的电影艺术正在掀起新的创作高潮，正在健康地向前发展。

* 本文原载1963年第11期《朝鮮电影》杂志。

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我们有正确、英明的党的文艺政策和金日成同志的教诲；是因为在党和领袖的教导下的红色电影工作者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他们深入现实，深刻地体会时代的精神和现实生活的本质，不断用革命的工人阶级的红色思想来武装自己，努力提高艺术技巧，发扬集体智慧；是因为我们坚定地高举现代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

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不但进一步推动了千里马朝鲜的电影艺术，产生了一系列完全体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艺术的党性、阶级性和人民性原则并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电影作品；我们的成就对正面地、无情地揭露和粉碎现代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反动美学信徒那些企图阉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艺术的党性原则的谬论来说，也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让我们具体地考察一下我们电影艺术的成就，这些成就正好证明了我们党的文艺政策和金日成同志的指示是正确的，是具有伟大生命力的。



电影艺术在贯彻金日成同志于1960年11月27日所作的指示的道路上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它正确地表现了时代精神。

表现时代精神，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艺术的精髓。能否表现时代精神，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电影艺术能否为党、为革命服务；因此，作者必须根据作品的主题思想，首先去表现出时代精神，对该时期党所提出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现实所提出的最迫切的问题在美学上作出解答。

金日成同志明确地提出了千里马时代文学艺术必须表现时代精神的原则及其解决途径。他强调指出创作那些反映千里马骑手的沸腾生活和战斗的现实题材的作品对提高文学艺术的时代精神所具有的巨大意义，谆谆教导我们这些掌握着有力的教育手段的电影工作者，必须大力创作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作品。他又指出，文学

艺术工作者一定要创作出这种作品，完成这一光荣的革命任务，以便进一步鼓舞劳动群众为实现我国宏伟的七年国民经济计划而英勇奋斗。

为了贯彻领袖的这些纲领性指示，电影工作者用自己的创作来执行我们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千里马运动服务，而且集中自己的主要力量，敏锐地抓住我们的革命现实所提出的许多迫切问题并对此在美学上作出解答。因而，这个期间所创作的电影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以千里马的现实生活为内容的，影片大多塑造了我们时代的英雄、党的红色战士——千里马骑手的卓越典型。

但是，我们不能只凭电影艺术为表现时代精神而采用了更多的现实题材这一事实，去直线地评价我们的成就。更重要的是要看：创作人员所提出的问题对揭示现实生活占有多大的意义，他们以多高的时代精神来阐明现实问题。因为时代精神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出发，要求创作人员不但掌握现实所提出的迫切问题，而且还要把它同革命的现实结合起来，忠实地、有力地进行美学上的阐释。

从这种角度来看，《分界线上的乡村》、《红色宣传员》、《海鸥号船员》、《百日红》、《红色花朵》等一系列故事片，都是成功地解决了时代精神要求的优秀作品。

在上述影片中，人物、事件、事实虽然本身都是个别的、特殊的，但是，它们体现了时代精神，包含着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从而充分刻划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这些典型又锐利地、深刻地表现了社会生活的哲理。

为了完美地实现时代精神的各项要求，创作人员首先必须深入到千里马骑手的思想、行动和朴素而真挚的日常生活中去，细致地观察他们——社会主义建设先驱者的精神面貌和新的共产主义品德。创作人员必须以高度的美学观点，掌握住生活发展的规律和真实的本质，并且通过有效的创作过程把它再现于优秀的艺术形象中，而不是去展示那种充满着各种奇迹和革新的建设工地的外貌或者罗列统计数字来令人吃惊。

如果不能达到这种地步，那么，尽管作品是以沸腾的现实、奇迹般的事件为题材，但依然不能保证时代精神得到充分体现。1960年以前的许多影片，虽然都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但是大部分都没有获得成功，这个教训是能说明问题的。

相反，最近几年来创作的一系列成功作品，都无例外地实现了上述要求。

故事片《红色宣传员》的主人公李善子的平凡而朴素的生活、她同落后分子福善、官弼、镇午等人的关系，虽然是个别的、特殊的，但是创作人员却在她的生活中，发现了具有千里马时代精神的社会性问题，即教育、改造所有的人（只要他不是敌人），使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创作者用具体的形象来体现这个主题，从而对这个为实现党所提出的革命任务而奋斗的现实生活，在美学上作出了阐释。

表现时代精神，这首先要求作家锐利地掌握革命实践，抓住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上予以解决，使之发挥有力的教育作用，对读者—观众的精神面貌发生影响。根据这个意义来看，最近几年来创作的一系列影片，显然是提出了十分深远的问题并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的。

故事片《百日红》通过深山峡谷中的一对落石监视员夫妇的生活，富于独创性地、深刻地解决了我们时代人的理想问题，即对革命工作的态度，对生活的乐趣和幸福的看法等问题。这部影片的创作人员通过一对夫妇的生活，表现了在千里马的前进道路上所出现的新与旧之争，圆满地解答了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

在这一方面，故事片《红色花朵》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这部影片的创作人员通过一个女教师的思想和行动，反映了伟大的时代精神，塑造了红色教师——千里马骑手的卓越典型，这部影片的主人公从高度的党性出发，认清教师的工作不是一门职业而是革命事业，她坚决按照党的要求，不把学生单纯教成“书呆子”，而是使他们成为多方面发展的有用人材，特别是加强对他们的阶级教育，

以革命的阶级意识去武装他们。《红色花朵》的创作人员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深入思索和深刻体验出发，以更为锐利而强烈的战斗性反映了现实问题，在结构上，作者把鎮石的母亲在旧社会被蹂躏的悲惨生活大胆地穿插到整个作品中，通过今昔生活的对比和交错表现，成功地解决了影片主题提出的任务。

荣获“人民奖”的故事片《分界线上的乡村》的创作人员，通过一个普通妇女在祖国解放战争的暂时后撤时期丈夫被美军逼到南朝鲜去以致家庭被拆散的遭遇，发掘了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并通过卓越的典型形象来加以阐述，从而使这部影片体现出我们党的革命群众路线的正确性及其伟大的生命力，起到了巨大的教育作用。

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创作方面，创作人员不是去罗列好人好事的素材或按样复写，而是在素材的基础上再深入体验，加以提高，使它升华为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然后热情地加以解决，这对电影如何表现时代精神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近年来创作的一系列优秀影片之所以获得成就，是与这一点有直接联系的。

今天，我们在提高党的红色电影艺术工作者创作思想的革命性的同时，也在电影艺术创作实践上有效地解决了革命性的问题，因而取得了电影艺术的迅速发展，使它积极地服务于人民的革命斗争。

二

金日成同志在1960年11月27日的指示中强调指出，文学艺术工作者十分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驱者——千里马骑手的卓越典型，并教导我们说，这种艺术典型必须能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教育和革新意义，以便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千里马骑手——英雄。

为了遵循金日成同志的指示，为了塑造出用一个优秀的模范人物来教育、改造成千上万人的艺术典型，电影工作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按照千里马时代的美学要求，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创造典型的问题。像李善子（《红色宣传员》的主人公——功勋演员宋英爱饰）、玄宇赫（《百日红》的主人公——功勋演员严吉善饰）、

金日福（《红色花朵》的主人公——沈明玉饰）、勇进（《海鸥号船员》的主人公——功勋演员严吉善饰）等形象，就是有代表性的例子。

这些人物都是朴素、平凡而真挚的人，同时又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他们性格上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按照“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去工作、学习和安排生活，都有高度的革命精神，而这种主要特征中又包含着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的美。

尽管善子、宇赫、日福、勇进等人的职业、年龄、文化水平和爱好各不相同，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他们的斗争精神和思想是一致的。总之，他们都是我们时代的英雄，是战士。

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能使正面主人公具有这种共性，其原因何在？因为这些特征乃是在我们千里马现实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千里马现实每天每时都在涌现无数共产主义的新人——千里马骑手，他们都是英雄。

我们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与我们同时代的英雄形象。这是由于我们把金日成同志所说的“千里马骑手是我们时代的英雄和党的红色战士”的话视作创作指针，是我们正确地沿着这条创作道路前进的具体结果和成就。

千里马骑手是开辟通往共产主义的险峻道路的时代的先驱者和英雄。在塑造千里马骑手的典型形象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完美地刻划出他们的英雄性格的核心和主要特征。

在这里，电影创作人员必须在非凡和平凡的有机统一中准确地刻划出千里马骑手的英雄性格。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上述的栩栩如生的性格，也是因为我们坚决遵照金日成同志在1951年6月30日接见创作界的骨干力量时就英雄的形象化问题所作的纲领性指示，圆满地实现了必须塑造与千里马时代相适应的典型这一要求。

塑造英雄性格决不能诉诸于任何简单的勇敢行为或建立奇迹般功勋的抽象说明，而是依靠对高尚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对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的具体描绘。英雄主义就是通过

这种具体的形象才能发扬光大。而李善子、玄宇赫的性格形象也正是鲜明的实例。

善子并没有出众的才干或力气，她只是比别人更坚强地、孜孜不倦地、机智和出色地完成了艰巨的工作，教育改造了落后分子，加强了集体，使集体具有一致的思想意志，并一致行动起来坚决贯彻执行“青山里指示”，在人与地没有更动的情况下，不到一年的功夫就获得了大丰收。她的英雄性格不仅表现在用自己的身体堵住堤坝的决口、救出了庄稼的事实上，而且还表现在她坚决按照领袖的指示和党的政策，为更好地、更快地贯彻这些指示和政策而日以继夜地思索、行动，她的努力终于影响了整个集体，掀起了集体的革新。

这就是电影创作人员正确地解决了同时代人的典型——千里马骑手的英雄形象的真正典范。

《百日红》中主人公玄宇赫的英雄性格是在与善子完全不同的环境下表现出来的。他的工作是平凡的，就是保证列车安全、正点运行。他是一个落石监视员。乍看起来，他的工作正如他的妻子金女所说，似乎干不出什么千里马的革新来。他在生活中并没有任何了不起的事迹或动人的革新事件。但是，作家和导演却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这位生活在深山峭所中的普通落石监视员的思想、行动所包含的英雄千里马时代的理想，然后用高超的笔调刻划了他的性格。这部影片的创作人员并没有单纯用他推掉被暴雨冲下来的巨大山石、保证列车安全通过的几件事情来“证实”主人公的英雄性格，而是准确地向读者和观众展示主人公的机智和优美的道德面貌，即他为崇高的革命理想，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进军而勇往直前的精神。

在塑造千里马骑手的典型形象方面取得的新的收获之一，是创作人员克服了性格形象化上的片面性，开始自由地、深刻而广阔地表现了千里马骑手的复杂多面、丰富而高尚、优美而细致的精神世界。

过去，有些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之所以刻划得片面而单调，其主

要原因在于创作人员没有从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中去塑造，他们以主观的判断束缚了形象，并企图用浩大的建筑工地、人为的戏剧性事件来表现性格的朝气和英雄的特征。现在，这种偏向基本上已被克服，为探索更加新的性格开辟了道路。

特别是在刻画那些体现了时代精神的崇高的人物性格方面，电影创作人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深入到他们高尚而深刻的精神世界去，锐利地、细腻地抓住了他们所有优美而机智的性格特征，并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

深入地去探索那些善于思考的主人公的形象或主人公的心理世界，这是通过《分界线上的乡村》到《百日红》一系列创作才出现的。

我们认为，我们电影艺术工作者所以能够塑造出有魅力的、朝气蓬勃的、深刻的性格特征，所以能够开拓出具有深刻哲理的主题领域，其保证在于：我们准确地深入了心理世界，并开始对它进行了有力的全面的描述。

假若我们对《分界线上的乡村》中的圣礼、《百日红》中的宇赫夫妇、《红色花朵》中的日福和镇石的精神世界没有进行深刻的探索，这些影片就不可能如此引起观众的共鸣。

当然，我们的一些影片过去也曾经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进行过深入描写。但是，最近创作的影片却有着新的特点，那就是这些影片开始通过一些促使主人公思索的因素及其因果关系去表现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并且有力地揭示出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而过去的影片往往只是通过直接说明喜怒哀乐的镜头或插入遮云的天空、弯月、瀑布和树林的画面或借叠印手法，图解式地直截了当地去表现主人公的思想。另一方面，我们目前的影片也不是单纯借走路、卧床沉思等画面，而是通过具体的生活来表现主人公的思想；不是依靠插入其他说明性的画面，而是更多地通过人物的行动来描写他们的心理活动。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准备在下面具体论述，这里只作一般性的

叙述。但是，我们愿再次强调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塑造出千里马骑手的典型性格，使它长久地激动着观众的心并成为他们精神上的朋友，其重要保证之一就是我们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三

为了正确地反映千里马现实，用生活的真理、革命斗争的理想去教育群众，作为剧作艺术的电影必须正确地解决戏剧冲突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戏剧冲突意味着在美学上把握了现实生活的核心，它对阐明主题和塑造形象有着首要意义。

因此，当我们谈到近年来电影创作的成就时，戏剧冲突问题引起了普遍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上，直到前几年为止，有些影片还由于没有正确地设计戏剧冲突而产生了一系列偏差和缺点。

就在这个时候，金日成同志明确地教导我们剧作艺术在反映千里马现实方面应当如何处理戏剧冲突的问题。金日成同志针对某些创作人员认为只有反面的东西多了才能构成电影剧本或戏剧作品这一观点，明确指出：问题在于把什么当作基础，只有把正面的、模范的实例当作基础，才能正确地反映我们的现实，才能正确地教育群众。

这个指示是根据这样的思想提出的：在我们的社会里，反面的东西已经处于次要地位，正面的东西成了基本的东西，所以主张在创作上少谈正面、多谈反面的观点本身就是歪曲了我们的现实。

电影工作者在深刻地体验了现实的基础上，对这种美学原则有着深刻体会，并且已在创作实践中正确地贯彻了这种原则，从而创作出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

在一系列获得成功的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里，贯穿于矛盾冲突之中的主要特征之一，首先就是正面的东西处于矛盾冲突的主流，戏剧的焦点集中于此，戏剧性的胚胎、发生、解决都归结于正面主

人公的进攻作用上。

在《红色宣传员》中，李善子同福善、官弼、鎮午等否定人物发生了正面冲突，在这个矛盾点上所出现的所有戏剧性的胚胎、发生都是由主人公善子的进攻性活动而形成的，戏剧性的解决也如此。

善子体现了崇高的时代精神，她对于否定人物所引起的一系列事件和事故，不是单纯地在事后去收拾或了结，而是一开始就不容许他们落后和停滞不前，她不断地影响他们去改造思想，走上新的道路。在这里产生了新旧之间的斗争、即戏剧性，否定人物终于在斗争中被改造过来。

在《百日红》中，主人公宇赫的妻子金女曾经是一个还未完全摆脱旧习惯的人，她片面地认为自己的理想只有在繁华的城市工地上才能实现。但是，宇赫对金女并没有简单地进行劝说或为此而苦闷，相反，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坚决按照党指出的道路勇敢前进。他前进得越远，他的妻子就越阻拦他，越企图实现自己旧的“理想”。这个过程就是新与旧的斗争过程，在这场斗争中处于主导地位始终是正面人物宇赫。他坚决实现自己的新的、美好的、革命的理想，使他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也改造了金女，与他共同前进。

同样情况在《海鸥号船员》或《红色花朵》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冲突的设计和正确处理正确地解答了新的千里马现实所提出的美学要求。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由于颠倒了冲突问题的主从地位而产生的许多偏向，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问题的解决对创作实践是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了，就可以深刻地感觉到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珍贵了。虽然那些认为戏剧冲突必须尖锐，以致人为地去制造冲突和夸大反面事物、歪曲或缩小现实的本质等偏向已得到克服，但是在创作中消除这种或那种缺点也并不是易如反掌的。

在解决戏剧冲突方面，另一个新成就就在于作者让正面事物居统治地位以后，并不完全忽视反面，相反，在不论何种形式的斗争

中，作者总是更加敏锐地、深刻地去发掘反面的东西所包含的戏剧冲突，并让它和对立面斗争，以便更完美地去体现社会性的问题。

在《百日红》或《海鸥号船员》以及其他影片里，戏剧冲突是尖锐的、深刻的。这种深刻性并非取决于冲突的数量和大小，而在于创作人员不管在表现外部冲突或者是内心斗争中，总是深刻地去阐明正面主人公的崇高理想，阐明与之形成对照或与之对立并发生冲突的否定人物的思想及其局限性，同时阐明人物坚持旧习惯、贪图安逸或停滞不前的思想根源是革命的前进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矛盾和冲突才体现了重大的社会意义，才是深刻而尖锐的。

在《分界线上的乡村》里，圣礼和承镇之间的戏剧冲突无疑是更尖锐了，但这样的尖锐性并不等于冲突的深刻性。在这部影片里，主人公圣礼坚信我们党的革命群众路线是正确的，因而她紧紧依靠党。党支部书记德礼则帮助圣礼勇敢地生活下去；但承镇却是个暗藏的特务，他蓄意诬蔑我们党的政策，破坏日益巩固的农业合作社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以便达到他们罪恶的目的。构成这部影片的戏剧冲突的是主人公圣礼、党支部书记德礼以及其他人物同间谍承镇之间的斗争，是让我们党的政策得到贯彻还是蒙受损害这样尖锐的矛盾。而影片安排的社会性问题正证实了党的革命群众路线是正确的，是具有伟大生命力的。

如上所述，我们在解决冲突问题上也开拓了新的美学境地，这不仅对真实地反映千里马现实具有巨大意义，而且对今后的创作实践来说也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四

如果没有把高度的思想性同高度的艺术性统一起来，那么，电影创作中的上述成就显然是不能取得的。

在近年来的一系列优秀电影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创作人员在电影语言上也有独到的构思，影片在表现形式上是新颖的、清新的、恰到好处的、有力的。

由于创作人员深入研究和体会了党的政策，深入了现实生活，掌握了生活的真实并学习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不断地磨练艺术创作技巧，所以他们都提高了艺术形象化的能力。

近年来成功的电影作品雄辩地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思想有准备的创作人员能够深入现实生活，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充分的思索，那么就不存在什么艺术感迟钝的问题，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创作人员才能发现独到的形象化技巧，才能提高作品的艺术性。

无疑，我国电影艺术的形象性是有了很大的提高，其重要的、鲜明的标志之一是，我们已把首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性格的刻划上，集中在深入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上。

在这里，我国电影对描述手段和造型手法的种种可能性的掌握已更熟练，同时，也进行了许多新的、独特的尝试。

导演、人民演员朴鹤在《分界线上的乡村》和《红色宣传员》两部影片中作出了出色的范例。他的导演工作中可贵的优点是：在认真处理演员的表演的基础上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致地结构画面，集中、有力地处理场面调度，巧妙地创造气氛等，这些特点同他所创作的有魅力的主人公形象一起，久久留在观众的记忆中。

导演、功勋艺术家千尚仁在《红色花朵》等一系列影片中，创造了可爱的、富于感染力的形象。特别是在《红色花朵》中，他创造性地、富于动作性地运用了蒙太奇，以恰到好处、与我们同时代人的审美观相称的速度，巧妙地表现了主人公既含蓄而又急速的心理发展过程，使观众的情绪变化和这种发展完全溶为一体。

青年导演崔益奎以他的《百日红》更好地美化了我们电影界的瑰丽花园。在宇赫夫妇的美丽的形象中渗透着他的创造性。对于电影导演来说，心理描写的确不是容易的，但是他却成功地解决了心理描写的各项任务。特别是他能很好地掌握随着主人公内心激荡而产生的微妙的情绪变化并把它同戏剧高潮结合起来，这种熟练的表现手法对这部影片的成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当母亲提出了全家搬到江界去住的“妙计”时，导演用金女匆